

表达空间的争夺:新媒体时代技术与社会的互构^①

——以7·23动车事故相关微博分析为例

施芸卿

摘要:本文以7·23动车事故的相关微博文本为例,关注新媒体以其独具的平等特性为草根群体赋权的过程与国家以其固有的垂直治理方式继续统治的过程之间的张力,如何贯穿大众和国家在面对公共议题时争夺各自的表达空间的始终,体现了置身于信息时代的转型中国所特有的技术与社会的互构过程。同时,网民发挥“主体性”,以网络为平台积极建构表达空间的尝试,滋养了一种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发声能力和自组织能力,开启了崭新的社会空间和公共生活,推动了国家-社会关系的重塑。

关键词:7·23 动车事故 微博 表达空间 技术与社会的互构

2011年7月23日,温州线动车组列车追尾事故令世人震惊,由互联网推动的舆论热潮,使之成为近年来影响最大的公共事件之一。据官方统计,这次事故造成40人(包括3名外籍人士)死亡,约200人受伤。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7·23动车事故并非我国同类公共交通事故中死伤最惨重的案例,如2008年4月28日,山东淄博胶州铁路王村站附近发生列车相撞出轨,造成72人死亡、416人受伤;1997年4月29日,湖南荣家湾发生列车相撞事故,死亡126人,重伤48人,轻伤182人。但是,温州线动车事故所引发的社会关注却是史无前例的,新媒体的应用是造成此间差异的一个重要变量。

2010年被坊间称之为“微博元年”。据CCNIC调查报告显示,2010-2011年,微博用户从6311万迅速增加到24988万人。随着各种群体的加入,讨论的热点也从最先对名人的关注,延伸到与大众更息息相关的社会和民生问题。在7·23动车事故中,微博产生的影响令人瞩目。在2011年底新浪微博公布的年度微博盘点中,7·23动车事故成为年度最热门话题;最后一位被救出的“奇迹”女孩小伊伊名列“年度微博感动人物”十大第三;铁道部新闻发言人那句“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名列年度网络用语十大第九;而在年度十大被转发微博中,“@陈利浩”为小伊伊捐款微博名列第一,“@浙江同省会动车寻亲名单”名列第二,“@chiaka”颂扬司机潘一恒的微博名列第六。另据媒体统计,事发12个小时后,微博上相关讨论量突破200万条,其中寻人的转发量超过50万条。截至7月26日下午16点,有关“温州动车追尾”的微博共6395840条,连续3天一直占据热门话题榜的第一位^②。

新媒体带来的技术进步,孕育着平等的力量,催生着新的社会空间,并对国家现有的总体性治理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以7·23动车事故为例,本文关注的核心议题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如何重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本案例中,微博的技术特性如何被草根群体建构成面对公共事件时最大化自我表达的契机?网民们不断拓展表达空间和行动空间的尝试,如何受到国家的型塑,又引发了国家怎样的应对?简言之,前者是新媒体以其独具的平等特性为草根群体赋权的过程,后

^① 本文在清华大学课题组《中国新趋势报告》中《微博:新社会空间的开启》一章的基础上修改完成,写作过程得益于孙立平教授、郭于华教授和沈原教授的指导和与课题组诸成员的讨论,在此致谢。文责自负。

^② 《温州动车追尾 上演惊魂救援72小时》,《中国经济新闻网》(<http://www.cet.com.cn/wzsy/ycxw/ycxw/271850.shtml>)

者是国家以其固有的垂直治^①理方式继续统治的过程,由此,互联网精神和总体性社会治理逻辑间的内在张力贯穿整个事件,体现了置身于信息时代的转型中国所特有的技术与社会的互构过程。

一、问题、理论及方法

本文借鉴了三条理论脉络:以技术与社会互构的辩证视角为讨论的基本出发点;结合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指出以平等为基点的互联网精神与以集权为基点的总体性社会治理体制两者内部存在张力,使这个互构过程在冲突和拉扯中前行;最后,引入行动者(网民)的“主体性”视角,以看到草根群体在行动实践中超越结构限制、扩张表达空间、形成自组织联结的力量。

(一)技术与社会的互构

以往对媒体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如下两派观点发展而来:一是秉持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将技术视为一个独立的因素或者一种自主力量,探讨技术在使用中如何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架构,引发社会变迁;另一个视角则是社会或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技术完全从属于它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环境中的发展和使用(Mesthene, 1991)。这两种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具体到当下的新媒体以及中国的特定体制,更多学术之外的作品也与这两种观点遥相呼应——凯文·凯利(2010)式的乐观和乔治·奥威尔(2006)式的悲观——前者相信以网络为图标的信息社会遵循的逻辑与以原子为图标的物质社会迥然相异,超文本协定所创造的新社会空间终将使人类脱离控制(Out of Control);后者则认为集权主义可以穿透一切,老大哥的凝视无处不在,即使信息社会到来,信息技术也只能更为当权者所用。

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学者提出了一些更为均衡和辩证的观点,例如,认为技术在塑造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些人类环境在塑造技术以及社会如何利用技术进步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Papp & Alberts, 年份不详,转引自胡泳,2008);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技术和社会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在特定情形下,任何一方都可能影响另一方朝不同的方面发展(Noble, 1979;胡泳,2008)。

从社会学视角出发,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是新媒体研究所不容忽视的重要变量,因此,以辩证的视角来看待技术和社会的互动显得尤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已有不少研究注意到了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复杂互构(胡泳,2008;陈秋虹,2011等),但新媒体对与社会不同层面(例如国家与草根这两个部分)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型塑过程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以7·23动车事故为一个具体案例,将实践社会学倡导的“过程-事件”分析延伸到新媒体提供的数字田野,试图将以往研究尚未深入的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具体互构过程带入分析视野。具体来说,正文部分将分析在动车事件中,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是如何给网民提供了契机,使其能暂时逃逸出国家惯有的对信息的严密管控,建构草根表达,并在信息的充分自由流动中成功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新空间,而以国家又是如何在当时及之后采取一系列应对,试图重塑互联网上的信息管控秩序。这个过程恰恰展示出,技术在改变社会的同时,也被社会打上了深刻烙印。

(二)互联网精神与总体性社会

互联网的出现及其引发的每次变革,都带来了某种意义上的边界跨越,首先是时间,其次是空间,再次是知识。“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使其成为一种时代的标志。由技术发展带来的信息传播被西方视为挑战威权国家社会控制的力量,例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曾在演讲中说:

^① 这种观点也被称为“硬性的”技术决定论,相应还有“温和派”的观点,认为某种特定技术的出现是一种促进或激励因素,能够导致一些潜在的机会,这些机会是否在特定的社会或年代中被利用,取决于社会组织(胡泳:2008:21)。

“技术变革会让国家对民众获取资讯的控制愈加困难,微电子晶片将推倒集权巨人”^①。

在中国背景下,总体性社会的集权政体与互联网的平等力量构成一对内在的张力,拉扯着推动上述技术与社会的互构过程。正如诸多论者以及普通网民感受到的那样,互联网对于高压环境下的中国的意味比其对西方国家深远得多。如果说,互联网在西方民主体制下,只是赋予公众的诸多表达渠道中的一种,那互联网在中国,则几乎是公众草根表达的唯一渠道。这种特定的制度背景塑造了中国互联网的独特生态:一方面,政府积极介入互联网,综合运用支持、引导和管控三种方式,建构全面的网络监管体系,如对互联网的不同应用领域开启不同的主导策略的“分类主导”模式^②,以及中国特有的自我审查机制^③(Kalathil & Boas, 2003; 李永刚, 2009);另一方面,以恶搞为典型的娱乐化表达成为中国互联网的独特景观,各种网络新语文的创造,其实质是一种“隐藏的文本”(斯科特, 1990)在高压管控下的凸显,以此来最大限度地规避审查,营造和扩充极为有限的表达空间。因此,中国背景下网络民主研究的一个独特问题是:新媒体是如何在一个高压环境下为草根群体赋权的?进一步,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是:作为一种可能培育能够抗衡当前转型中社会结构失衡的草根力量的公共平台而被寄予厚望的互联网,能否在一个欠缺历史传承和实践空间的条件下,真正滋养出时代所呼唤的公民精神?

(三)公民表达与网民主体性

有关公民权(citizenship)^④的讨论,近年来不断见诸于社会学的研究,其背后隐含着对中国转型道路的根本关切:用以抗衡国家和市场联袂登场的“社会”的力量能否生成?将如何生成?因此,在这种理论关怀下,“社会”被理解为一种公民之间由自组织而形成的社会联结,强调其在独立于国家和市场的自主发声上的意义。互联网的引入,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联结如何通过无数个个体化表达的汇集而形成的新的行动场域^⑤,这就牵涉到网络政治学的一个重大议题:网络中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胡泳的研究指出,以当前中国互联网为背景,公域和私域不能看做结构性的东西,而必须视之为一种流动的过程。经由新的共有媒体的作用,传统的公私两分将在社会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消长和易位。而对于中国这样公共领域并不发达的国家,互联网可能成为普通公民抵制信息垄断和发出声音的唯一出口,也许不能一夜之间改变中国政治,但却能够促进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发展(胡泳, 2008)。

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建立在理性的对话和参与之上,是民主化决策的支柱,在此意义上,互联网提供了公民在决策过程中彼此互动的可能性。阿伦特也对沟通和互动对于公共行动的意义作了重申,认为一个场所之所以能成为公共空间,不取决于它本来面貌是市政厅还是私人餐馆,而在于它必须是一个“协力行动的地点”,是“权力起作用的地方,是通过交谈和说服而使公共行动得以

① Ronald Reagan, speech at London's Guildhall, June 14, 1989.

② 该模式指:对互联网的经济和科技功能强势扶持,对网络表达和信息传播功能则加以引导。

③ 自我审查机制是中国政府对互联网控制的最有效手段。其运作一般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对所有新老用户公示的“社区规则”(中国所有的网站在其首页或醒目处都有内容如出一辙的“删文与封禁规定”,强调不得在网站上发表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的内容);其次是重大政治事件或者突发敏感事件中的应急管理;再次是专门组建网站巡视队伍。在国家级别的监管技术系统全方位扫描过滤的同时,机构自我审查的功能是事前过滤和随时清除漏网的有害内容。

④ 关于 citizenship 目前国内有多种不同的翻译,如公民权(利)、公民资格、公民身份、公民权责、公民制度、公民性、公民,各有侧重。本文以马歇尔在《公民权与社会阶级》(1992)中的讨论为出发点,强调公民权各部分的生成与公民个体相互形成自组织社会联系之间的关联,其中,“言论、思想、信仰自由的权利”是马歇尔定义的“民事权”(civil right)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公民表达是公民权中最基本的一项。

⑤ 虽然以社会自组织联结的形成共同的着眼点,但从互联网来讨论和从现实中讨论有所不同,现实中,话语表达只是一个部分,更重要的还有一个行动的部分;而在互联网上,所有的网上行动都基于某种形式的表达(文字、符号、图片、视频等),表达可被视为一种广义的行动,线下行动只是对网络上的表达的一种扩充(并不是必须成分)。

协调的地方”(Benhabib,1992:78)。因此,基于话语的沟通互动是滋养公民精神的土壤,也是公共行动的根本。较之中国曾有的其他公共空间,恰恰是在互联网带来的新场域中,个体化的草根表达被前所未有地凸显,成为一股可能引发变革的力量。

不过,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在总体性社会的制度背景下,权力的严密控制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对于新媒体所引领的沟通与表达也不例外,再次展现了技术与社会互构过程中的复杂性。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以行动社会学的立场,将行动者带回到社会事件分析的核心,凸显其在严密的体制下以各种大众智慧及极其有限的可得资源创造行动空间的“主体性”。在图海纳脉络下,对于“主体性”的讨论强调行动者在实践中通过行动穿透社会结构的力量,从个人主体迈向历史主体的过程,即“社会性行动由反抗权力的抗争进步为更合理的社会发生的过程”(丘延亮,2002)。不过,现有研究中,以该理论脉络进行的多集中社会运动、集体维权领域(夏晓娟,2006;沈原,2007;施芸卿,2007;郭于华,2011),这是一种有激烈对抗发生的社会情境,权力的强大和行动者的弱小形成鲜明的对比,行动者多为直接利益相关人,受到的侵害较为具体,通常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并对自身主体性进行积极建构,从而获得在严密体制下生产和营造抗争空间的机会。而网络情境则与之不同,虽然近年来汇聚关注焦点的公共事件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对立情绪,但是这些事件和绝大多数行动者并非直接利益相关,而是一种潜在被侵害的可能,较之各种维权行动,网络参与带有更大的随意性,而其主体性的建构也显得更加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呈现出“群集式”网民主体的特征:即只有当参与人数足够多时,才会逐渐发展出一种集体性的主体意识,在狭窄制度背景下建构和扩张行动空间,呈现出“群蜂思维”^①穿透权力控制的强大力量。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特定公共事件为中心,网民在微博上看似随意而碎片化的个人表达,汇聚在一起时便具备了难以言说的智慧和策略,使“群集式”网民主体能够充分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技术手段,由表达实现自我赋权,并在与体制的严密控制的互动和争夺中,使微博空间从一个个人化的符号空间建构成具有公共意涵的行动空间。

在方法论上,本研究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尝试性地以数字时代的新媒体为社会学研究新田野。在信息时代,社会学所面对的社会事实本身已发生了变化。正如凯文·凯利(2010)所指出的,网络带来的是一种“去中心化”模式,意义的生产被重新交还于遍布各个节点的网民个体,超链接所建构的是一个容纳观念、思想和知识的崭新空间,而读者承担着共同决定文本含义的新角色,因此,这种“分布式管理”的“群系统”,宣告了“权威的终结”。社会生活的去中心化与去权威化从虚拟空间向现实逐步渗透,形成对权力中心的监督与某种意义上的颠覆。面对社会事实建构的这种根本性变化,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在即时性和多元性上存在欠缺。首先,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成熟,网络事件与现实事件也日益交融,转瞬即逝性是数字田野的一个基本特征,使传统社会学方法及其资料收集模式不及网络提供的各种“即时”和“在场”的记录快速、完整与真实;其次,网络材料具有鲜明的民间性,提供了官方表述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更有助于我们对所处的时代气质与社会结构进行研究和反思(郭于华等,2011)。当然,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网络材料的全面运用也需要我们对其信度与效度、权威性与选择性、匿名性与真实性、直接性与间接性、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之间可能出现的偏差进行反思。

二是坚持“将事件置于研究中心”,以过程-事件分析为逻辑思考的立足点。本研究围绕动车事故的进展,将微博及网络舆论热潮分为几个阶段:事发两小时内、国家介入救援至救援结束、遇难

^① 凯文·凯利(2010)以“群蜂思维”来比喻一个由大量简单个体由与蜂巢似的网络联结而成的一个有机体,如蜂群一样,这样一个有机体“是一种持续的波涌或者进程”,它的神奇在于,“没有一只蜜蜂控制它,但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从大量愚钝的成员中涌现出来的手,控制着整个群体。它的神奇还在于,量变引起质变。要想从单个虫子的机体过渡到集群机体,只要增加虫子的数量,使大量蜜蜂聚集在一起,使它们能够相互交流。等到某一阶段,当复杂度达到某一程度时,‘集群’就会从虫子中涌现出来。虫子的固有属性就蕴含了集群,蕴含了这种神奇。我们在蜂箱中发现的一切,都潜藏的蜜蜂的个体之中。不过,你尽管可以用回旋加速器和X光机来探查一只蜜蜂,但是永远也不能从中找出蜂巢的特性”。

者头七祭奠、半年后围绕事故报告的真相探究阶段以及一年以后国家对微博实施新的控制方式。各阶段中,网民和国家的力量体现出此消彼长、相互型塑,充分体现为一种“表达空间的争夺”,本文正试图通过对这个争夺过程的分析,展示置于信息时代的转型中国所特有的技术和社会的互构过程。

在具体操作上,本研究以一手材料为主要分析依据,以二手材料作为尽可能全面收集重要一手材料的辅助线索,围绕动车事故尽可能全面收集网络上相关原始微博、视频、媒体报道、事故报告及论坛讨论^①。以类似于传统调查方法中处理定性调查资料的方法,对事故当事人、温州市民团体、公共人士(维权人士、公共知识分子)、官方媒体等几类网民自事故发生以来的微博进行归纳整理并截图保存。为保证真实性,研究最终引用的为原始微博、视频中所呈现的对当事人的访谈及媒体报道中的事实性材料等尽可能接近第一手的田野材料。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进一步尝试用一些针对新媒体的研究软件收集所有事件相关微博,以统计分析辅助过程-事件分析。

二、数字空间的赋权：技术进步中的平等力量

作为互联网上的数字平台,微博的崛起是 web2.0 时代^②的标志。源于 Twitter 的微博,在中国虽经过了诸多本土化修正,但仍保留了 Twitter 最为核心的“链式传播”模式。这是一种无中心的、双向的、无群组的完全独立的传播模式。只要你的信息引起了别人的讨论,在讨论的同时就会被传播,传播的同时又可以被引发新的讨论,信息顺着无数条链路如同核爆一样扩散。这种传播模式完全不同于总体性社会思维下围绕中心进行信息生产和分层分级实施信息管控的模式,而将互联网赋予网民的、以遍布于无数网络节点的使用者为中心的沟通和互动意涵提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点。这是一种蕴藏在技术进步中的平等力量,提供了如下几种为草根赋权的潜在机制:

(一)削平话语能力及权利差异

微博最初的卖点在于“微”,仿照 twitter 而来的 140 字内容限制,在微博和博客、论坛这些传统网站之间划出一道分水岭。字数限制加快了信息生产和信息接收的速度,也削平了话语能力的门槛,使网络时代赋予大众的麦克风更加平等地传递到每个人手上。如清晨起来小鸟叽叽喳喳般的、足够简单却无时无刻不萦绕于耳的话语模式,使每个有意参与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网络互动参与平台,最大程度地动员起了潜在的使用者。据 CNNIC《第 3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截至 2013 年 1 月,微博用户已达 3.09 亿。足够多的使用者形成一个能量巨大的社会资源库,使微博成为“万能的微博”。

同时,基于 SNS 网站理念建构的微博,经由人际网络搭建信息平台,不仅改变了信息生产方式,更改变了信息接收方式。在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体验中,信息生产者背后站着强大的国家,而公众只能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网络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电脑后的个体在选择和接收信息时的主动性,而微博的出现,则更将这种“个性化”的信息接收,以“定制”的概念、“推送”的方式推向极致。以“粉丝”形式呈现的主动关注及以@为方向发出的主动传递,使人人分饰两角,既是主动的信息生产者,又是主动的信息接受者,夷平了传统信息生产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权力差异。诚然,各界公众人物很有可能因其现实影响力而吸引到更多的粉丝,从而在虚拟世界中也具备

^① 媒体报道是重要的二手材料,其优势在于经记者和编辑的整合后,事件过程得以全面清晰地呈现,因此,整合多篇报道所提供的信息线索,能在信息海洋中最有效地追溯到处于推动事件进展关键节点(以转发量为标志)的原始微博,并随后从事故时间轴及同一博主的相关微博两个维度再进一步收集尽可能多的原始信息。

^② 较之 web1.0 时代,web2.0 的信息流量更大,网页不再仅仅只是一个针对人阅读的发布平台,而成为交互的场所。在个体体验上,web2.0 带来的是一种可读写的网络,表现于用户是一种双通道的交流模式,也就是说网页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传统的“push”模式演变成双向交流的“Two-Way Communication”模式。其技术上的应用元素包括:博客、RSS(简易聚合)、Web service、开放式 APIs(应用程序接口)、Wiki(维基)、Tags(分类分众标签)、Bookmark(社会性书签)、SN(社会网络)、Ajax(异步传输)等等。

更多的话语权,但这并不改变对其话语的接收也是粉丝们主动选择的事实,由此,传统模式下的强制性权力,转为一种含有霸权成分的更为隐蔽的影响力。虽说在微博上,未必人人都有同等的话语权力,但至少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说话的权利,微博也由此被赋予了公共性,以其卷入人数之众多、发言之便捷、互动之活跃、话语权利之平等,构筑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公共交往平台。

(二)重构“现场”与“在场”

如果说微博以140字的限制、主动关注的信息接受模式以及有意识@的信息传递模式,使每个人都成为分散式^①信息的平等的生产者及潜在的传播者,那么,微博与移动互联网(手机终端)的结合,更是带来了变革性的力量,真正实现了“随时随地”发布信息。

据第29次CNNIC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占整体网民比例的69.3%。规模庞大的手机网民成为无处不在的目击证人,每次公共事件过后,都有大量实拍图片、视频被上传到网上,使公共议题以个体化草根编导的方式呈现在全民面前,赋予了公众解读真相的资格和资源。权力在前网络时代通过时空边界的切割、内容呈现的选择性编排及传播过程的强力主导所有效实现的信息控制,被技术的进步再度跨越,网民个体化的拍摄、发帖、转帖在超链接空间中汇集,似“无影灯”照射全过程,重构了公共事件中的“在场”与“现场”,重塑了信息生产中的权力关系。

与此同时,信息的高速自由流动赋予了每条碎片化信息自主粘合的生命力,使其滚动汇集成有效的社会动员联结,如事故发生之后,温州市民自发的救助行为,进一步丰富了“现场”的实践内涵,显示出一股萌生的社会力量。

(三)再塑信息生产传播中的成本差异

微博本土化的修正之一是添加了“上传附件”的设置,该功能原本被定位于娱乐或者营销以吸引用户,但在实践中,被构造为一种挑战网络控制监管的有效机制。“附件”可以整合图片、视频等多种多媒体文件,恰似国画中的“留白”,提供了一个令网民可以无限扩充的自由平台。

诚然,在很大比例上,“附件”仍发挥着娱乐和营销的功能,但在针对公共事件的讨论中,“附件”的作用不容忽视:以“长微博”形式出现的附件有效地拓展了140字的表达空间,可以使一些复杂观点的表述、真相还原成为可能;以图片形式出现的附件,往往是一些实拍现场的照片、网友有针对性创作的漫画或者传统媒体刊出或因各种原因无法刊出的版面;以视频出现的附件,同样可以是一些实际拍摄或者网友有针对性制作的短片。“上传附件”功能对于技术对草根赋权的本质在于,在拓宽网民用于信息生产和加工的方式的同时,维持了传播的低成本——传播带有附件的微博和不带附件的微博成本并无明显差异,只需点两个按钮,等几秒钟即可。加之微博所特有的“病毒式”传播的特性,使新媒体第一次带来这样一种状况:公众生产和传播信息的成本很小,而国家若要继续维持严密管控,通过敏感词过滤、人工删除等措施剔除其认为可能危害统治的信息时,所花费的成本将远远超过公众生产和传播的成本^②。这种成本倒置,再度宣称着新技术带来的平等力量。

^① 以往研究或评论中对微博特征常以“碎片化”表述,英文为 Fragmentation,原意为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是描述当前中国传播语境的一个形象性的说法(百度百科:碎片化);强调零块的形式是从原有整体中被机械地敲碎而来,有自上而下的意涵。凯文·凯利《失控》一书中用以描述电脑网络变革性力量的核心概念为“分布式”,英文为 Distribute being,强调位于网络节点上的并行连结,以使基于单个个体聚集而成的整体最终拥有单个个体不可能具备的能力。由于“分布式”的指称过于计算机语言,本文采取“分散式”的定义,沿循其概念意涵,以区别自上而下分裂开来的“碎片化”,强调网络信息生产自下而上的本质,以及随之产生的海量信息片断最终得以有机整合的可能。

^② 在使用微博时可以发现,即使如此,国家机器仍然在运转。目前比较常见微博管理有:发布时的敏感词过滤,转发后的原帖删除。但无论如何,一是在删除前信息仍可以有几小时的传播时间,二是即使被删除,相同的内容也可以很容易再次重复发表。

新媒体带来的自主表达和中国国情下的严密管控,由始至终型塑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新媒体进步的目标在于提供一种最简规则和最大空间,“开放”式的网络架构所汇集的群体智慧是其原生动力。在管控的高压之下,最简规则恰恰提供了最大化激发网民的主体性和创造力的空间。下文将以7·23动车事故中的公共表达为例,分析微博在技术层面提供的构造表达空间的潜力是如何被网民充分激活,而针对公共议题的表达,又如何在互联网的平等力量和总体性社会垂直控制的张力和冲突中,被不断拉扯和建构。

三、表达空间的争夺：一个在拉扯中互构的过程

(一)现场：网民播报

在“7·23温甬线动车组重大追尾事故”中,首次出现事故第一现场由公众播报而政府部门缺席的情况。从与事故有关的第一条微博消息到事发之后国内媒体在互联网上报道及地方领导到场中间相隔两个小时,微博成为在此期间唯一的消息扩散、求援互助渠道。并且,微博以自述的形式成为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图文并存,在官方媒体之外直观地记录了整个事件的经过^①。

“Smm_苗”是温甬铁路的沿线居民,在事故前7分钟(7月23日20:27),她发了一条微博:“暴雨后的动车这是怎么了?爬的比蜗牛还慢……可别出啥事儿啊”,并贴了一张漆黑夜幕中动车的模糊照片。此条微博被转发2.4万次,评论7600多条^②。

“袁小芜”是追尾动车上的乘客,在事故后4分钟(20:38分)在微博上发出了动车事故的第一条消息:“D301在温州出事了,突然紧急停车了,有很强烈的撞击。还撞了两次!全部停电了!!!我在最后一节车厢。保佑没事!!现在太恐怖了!!”(转发1438次)。

事发后13分钟(20:47),乘客“羊圈圈羊”发出第一条求救微博:“求救!动车D301现在脱轨在距离温州南站不远处!现在车厢里孩子的哭声一片!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出来!快点救我们!”(转发110272次)。

事发后20分钟,另一位网友“sam是我”手机实拍车厢内状况求救(21:01):“童鞋们快救救偶吧!!!偶所乘坐的D3115次动车出轨叻!!!偶被困在近温州南的半路上叻!!!火车也不安全,以后偶们都改步行吧!!!求救!!!求救!!!看到此围脖的童鞋请帮忙速转发!!!”(附图:倾斜的车厢;转发10388次)。袁小芜微博继续汇报动车脱轨(21:13):“据说高架桥塌了,前边有四节车厢掉下去了。我们最后两节车厢已经脱离出来了。太恐怖了。万幸自己没什么事。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车厢里很闷。窗户也砸不开”(转发391次)。值得注意的是,袁小芜在随后的一条微博(21:25)“下车了。沿着铁道走。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我还活着”中还插入了大头针标记的定位信息,显示“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金丽温高速出口”另附“显示地图”链接,通过手机的卫星定位,明确地标注了自己所在位置。

事发后1小时(21:41),网友“摄影师小刀的地盘”发布“众志成城的抢救”两幅现场群众自救的照片,被转发2766次和2668次。这些照片成为了后来提供给各大媒体的第一批现场照片^③。

事发后2小时(22:45),“羊圈圈羊”发布第一条获救信息:“警察救我们了,我们已经从高铁架上下来了,上帝保佑!”(转发9391次)。

事故现场消息播报中引人注目的还有温州市民动力伞航拍视频,据2011年7月25日《东方卫报》对陈斌的采访,“6点40分,我从江边上起飞的,大概花了6分钟,就到达了事故现场……我拍的时候,还没有开始清理车厢,后来浙江台的直升机过来时,现场已经在清理了,可以说只有我是唯一一个航拍到了整个原始画面的人……早上航拍刚结束落地,手机里就有几十个未接来电,都是找

① 资料来源:新浪微博。

② 成文时,该微博已被博主删除。转发数据参考《到了用网络倒逼改革的时候了》(作者:祝华新)《中国青年报》2011年07月25日03版。

③ 《通过现场照,“小刀”帮网友找到了舅舅》,载《东方卫报》2011年7月25日。

我要航拍视频的。今天连央视都是用的我的画面。”

出于信息时代的本能,事发现场及附近的居民这些真正物理意义上的“在场者”成为事故的最初播报者,他们拿起手机、相机、摄像机和电脑,以无数个体的个人表达,最大程度地记录了事件的最初样貌,汇集成未经权力设计的公共表达,并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国家首度在第一时间对重大事故播报中缺席,包括央视在内的传统媒体都转而求助于掌握在公众手中的第一现场资料。可以说,在事发之初,新媒体以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庞大信息源以及信息传播效率,成为事件报道的先锋队,主导了整个最初报道,重构了国家与草根在信息生产中的权力关系。

(二)救援:国家警戒

“羊圈圈羊”事发后2个小时发送的第一条获救消息标志着国家的到场^①,与警察接踵而至的是各级地方和铁道部官员以及各大新闻媒体的前线记者。至此,事故进入官方处理流程,随之启动的是一系列现场及信息控制措施,标志着国家权力的“警戒线”隔开了“围观”的公众。

据《中国经济周刊》^②报道,据当晚目击市民回忆,晚9点10分左右,消防车呼啸着赶到了,紧随其后的是武警战士、公安人员、医疗救护人员和政府官员,“当晚,‘专业抢险人员’先是拉上警戒线不许外人靠近,随后,又召集‘看热闹’的年轻男性加入到抢险队”。在场媒体人“朋小水^③”的微博也证实了这一情况,“这是紧靠着事故的村庄,村庄已经和外界拉起警戒线,出入必须要有当地暂住证和身份证。其他无关人员一律不许进入,记者更是不许上前靠近”(附图:拉有警戒线的村庄,警戒线外是两位身着浅蓝制服的民警。发表时间:7月25日12:35;转发4856次。)

警戒线的拉起意味着国家权力以隔离事故现场的方式对该事件所引起的公共表达的第一次型塑。警戒线所标志的空间区隔重置了事发之初由互联网动员的公众在信息生产中面对国家机器的优势,终结了公众对物理现场的短暂贴近,赋予国家垄断真相的权利。此时的“在场”不再是单纯的空间所指,而带上了权力的强制力与选择性。

但是,微博公民并没有就此放弃。与前微博时代不同,在微博时代,国家和媒体重新还原为一个个具体的官员和媒体人,自语式的个人网络主页削弱了个人观点与官方说法之间的捆绑,因此,我们看到,在对国家介入后的事故处理进程的第一手报道中,草根公民记者手中的接力棒可以调用更多资源、可进入国家警戒区域的专业记者接上,而专业记者又同样以发布微博方式,及时报道自己在现场的所见所感。专业记者藉由因其特定身份所附带的资源获得的、却以个人名义滚动式发布的短消息,不需要等待传统媒体成文、编排、审查、印刷/播出的流程,也不需要头顶时刻高悬一把“政治正确”达摩克里斯之剑,创造了另一种国家与公民相结合的新闻报道模式,跨越了现场的“警戒线”。专业记者的微博报道与其体制内身份的分离是公众在被警戒线隔开之后之所以能够持续接近真相的一个关键点,恰恰正是这种分离,体现了国家的信息控制和公众自主表达之间的张力。

同时,通过各种人际链条“关注”而集结起来的上亿双眼睛,成为现场每个细节的录影机和放大镜,使真相再一次跨越时空“边界”,实现网络上的“全民在场”。铁道部处理事故的每个环节,都引发新一波的民意质疑和愤怒汇集,公众表达与官方表达首次在此大规模地交汇对峙。《南方都市报》^④将质疑总结为四点:通车第一救人第二? 填埋车头销毁证据? “自动停车”为何失效? 为何没

^① 在2011年12月28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7·23温甬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第三部分“事故应急处置情况”中所显示警方事故发生后十多分钟即到场,最早到场的时间为“20时42分,温州市公安消防支队鞋都中队的22名官兵赶到现场,立即展开搜救工作”。在此不排除警方实际到场时间与网友个人看到警方之间的存在时间差的可能。

^②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调查:铁道部被指事后处理草率》,载《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8月2日(<http://www.sina.com.cn>)。

^③ 为化名。出于研究伦理考虑,以下所提及的各种媒体人的微博名均为化名。

^④ 《铁道部再度否认“先抢通车 搜救其次”》,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31日。

有失踪人数？追溯微博记录，可以看到，引发这四点基本质疑的一些具体事件，例如小伊伊获救^①、司机潘一恒殉职^②、铲车处理残骸现场等，无不被大量转发，成为汇集民愤的焦点。

在每一条转发背后，都有一双电脑后的眼睛，他们随在场记者、当事人及其亲属亲临现场。因而，纵使“警戒线”被拉起，事故“现场”被隔离，但公众表达并没有被隔断。网络围观超越了物理“现场”，实现了全民“在场”，各种细节被放大和挖掘，使整个事故处理进程被暴露在网络“无影灯”之下。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新媒体时代催生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众话语权的强化，在7-23动车事故中首次转而影响和鼓舞了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反引网络中的信息、评论，两者形成合力^③，碎片化的网络公众表达因有了传统媒体加盟而更有条理、力度和合法性，在与官方话语的拉扯和对峙中，形塑着整个事件的公共表达，使国家不再安然处于代言事故真相的天然道德高地。

(三)头七：撤版风波

7月29日，动车事故头七前一天，中宣部下达了淡化事故报道的指令，成为国家对这次事件的第二次重大型塑，引发体制内媒体的集体抗议。一位广州媒体人的话被多处转载：“今夜，百家报纸在撤版，千位记者被毙稿；中国，万个游魂无处安放，亿个真相正在破碎。这个国家，无数只恶棍的手，在羞辱着你。”制度内表达渠道遭遇阻力后，网络成为另一个表达的出口。部分媒体从业者以个人的名义，将辛苦做成却被撤下的版面在微博上以附件图片形式贴出。

@小菜(7月30日00:27)：噩耗：#温州动车追尾#惟一最后的火种，@李天的逝者，因故无法与读者见面。立版存照。哀悼。祝死者安息。——之前发言过火，此次改为平和叙述(附图为《新京报》已完成的报纸版面，大标题为《坚持过，希望过，他没等来奇迹》；转发573次)。

《新京报》7月30日被撤下的头版换上一副暴雨的照片，大标题是《七日雨未绝 一天两预警》，“@摄影师程木”将此图片贴上微博(7月30日8:32)，并附以文字：“昨夜夜黑，暴雨肆虐，浑浊汇集成河，骄傲的横冲直撞，让黑夜里顽强行走的人们，也不得不四处避让。今晨，雨过天晴，7天的悲伤，没有因为第八天的到来，而盼来希望，平抚忧伤。从现场的掩埋真相，到昨夜扼杀舆论掩盖真相，他们的狰狞已显。这个世界，不仅，生命如草芥，连亡灵都没有安息的地方”(转发3096次)。

体制命令虽能使传统媒体噤声，却无法阻挡网络上的头七纪念汹涌如潮，并且，互联网所提供的多媒体技术使网民的公共表达更为多样。各种被撤版面、铁路桥下的鲜花和蜡烛、桥墩上的无名诗作^④、亲人们含泪的照片等各种图片在微博附件中汇总，被大量转发；事故被拍摄成视频、制作成歌曲，汇集到各个视频网站，同样通过微博后附的链接被广泛传播。草根表达的铺天盖地、形形色色与制度内表达的悄无声息、转换话题形成鲜明对比，网络歌曲《伤不起的动车》^⑤唱出了公众的心声：

苍茫大地一片哭泣/几十条生命就这样失去/无语问苍天谁的悲剧/高速动车不堪雷一击/
铁道部大爷/请你铭记/安全第一生命第一/极端天气/没有预警/电闪雷鸣/就让你停息/雷公
你惹不起也该躲的起/为何两车追尾玩亲亲/调度的大爷/你是否太大意/后出发的跑到前面

① 小伊伊获救被迅速建构成各界的行动机会，对小女孩关注的背后是对铁道部从指挥救援、切割车体、公布死亡人数及名单、召开新闻发布会、拟定赔偿方案等各个环节的质问。最初媒体人报道获救信息的微博(@新民周刊杨江)，伊伊父母生前发的微博(@项余岸，@一一成长回忆录)，呼吁为伊伊捐款以及为坚持救援的特警记功的微博(@陈利浩)，都在短时期内被转发数十万次。

② 后车司机潘一恒的殉职，成为另一波愤怒与悲悯交织的引爆点。@姚晨以死者朋友女儿的身份发表的微博被转发20余万次，网友@chiaka一条颂扬潘一恒的微博成为2011年度十大转发微博第六。

③ 如《经济观察报》2011年8月1日头版《温州没有奇迹》、《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31日《他妈的“奇迹”!!!》，《新京报》原拟刊于2011年7月30日的《逝者》、《目击：我们都是幸存者》(未刊)等等。

④ 《动车脱轨祭》：电闪雷鸣雨瓢泼，动车脱轨鹿城泣。几多美梦碎断途，一众哀思挂残车。骤雨易洗两行泪，盛夏难暖半颗心。勿勿别吻情犹在，悠悠离恨潮已生。笔者根据视频《天堂列车》中的照片整理。

⑤ 又名《动车的悲剧》(原曲：《梦中的额吉》)，改编：声琴相拥；演唱：声琴相拥；制作：歪歌公社。视频原址土豆网，但截至笔者成稿之日，该视频已被删去。

去/铁路出息/净搞大跃进/技术不精/速度却争第一/粗放管理/安全不注意/天灾人祸混合在一起/铁道部大爷/请你铭记/安全第一绝对不是儿戏/铁道部大爷/我求求您/生命最贵/人民伤不起/生命最贵/人民伤不起

(四)半年后:何为真相?

动车事故中,各种愤怒的呼喊最后汇集为对“真相”的追问和对生命尊严的呐喊。而实际上,真相不仅是事实,还包括用于解释事实的专业知识,正如福柯所指,知识同样也是权力用于统治的工具。围绕着真相的各种建构,同样描绘出网络时代国家与公众之间对于表达空间的争夺。

事故发生后,对真相的承诺成为官方的首要表态。事发后,温家宝总理在动车事故现场表示,“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要一查到底,如果背后隐藏着腐败问题,将依法处理,毫不手软;事故能否处理好,关键在于能否让群众得到真相”^①。8月10日,国务院成立“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和专家组,由35位有关政府部门官员及公共交通研究专家组成。之后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调查结果的阶段,几度拖延,2011年12月28日晚,国家安监总局网站间公布了“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②。

长达半年的拖延一再考验着公众的耐心,并为民间真相的建构提供了契机。头七之后,关于真相的追问充斥互联网,引发一系列网民及公众人士的行动。新浪V认证为“著名的土地维权专家、致力于北京胡同保护工作”的华新民女士,其祖父华南圭先生曾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动车事故之后,她在个人博客和微博上发起“报平安”活动:“为了每一个生命的尊严,为了保证没有一个人被抛弃,请7.23温州动车惨案中情况最严重的六节车厢的旅客来我这里报一个平安!同时修正和补充一下我们所整合的已知的遇难和生还信息(详见<http://t.cn/a3bEv9>)!一个多月了,始终没有见到铁道部部长履行他的公开承诺——公布相关车厢的旅客名单!”(8月31日,转发9863次)。在链接指向的她本人的博客^③中,华女士整理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6节事故车厢中乘客和工作人员的姓名、座位、伤势、亲属关系,以及通过救治渠道整理的座位不详的乘客姓名,成为一份民间的旅客名单^④,构成民间检验政府数据、解读真相的一份重要材料。

① 来源:《东方早报》2012年7月29日,头版。

② 2011年12月28日(事故发生后158天),附有“国务院‘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签字表”的《“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公布,事故被定性为“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归因为:“通信信号集团公司所属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在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研发中管理混乱,通信信号集团公司作为甬温线通信信号集成总承包商履行职责不力,致使为甬温线温州南站提供的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和重大安全隐患”;“铁道部在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招投标、技术审查、上道使用等方面违规操作、把关不严,致使其上道使用”;“上海铁路局相关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在设备故障发生后,未认真地履行职责,故障处置工作不得力,未能起到可能避免事故发生或减轻事故损失的作用”。通号集团、铁道部及上海铁路局为事故三大归责方,54名有关负责人员被追责。因报告专业术语过多,随之发布的还有一份名词解释,其中包括“轨道电路”、“行车许可”、“通过信号”、“车机联控”、“客运专线”、“自动闭塞方式”等

③ 《不能忘记!不能抛弃!请来我这里报个平安!》(<http://huaxinmin.blog.163.com/blog/static/11890996420117315472841>)。

④ 9月4日,华新民又向铁道部发起了索要名单的“每日一问”:“关于公布相关车厢的旅客名单,铁道部部长说了,‘可以’。这个‘可以’,是对温总理的承诺,是对遇难者家属的承诺,也是对全国人民的承诺。我们在等待,已经等了一个多月,还等到什么时候?”(转发2750次)。以微博为载体的非正式的“每日一问”在经过20问之后,被转化为一封符合信访程序的《就旅客名单致铁道部长的信》,签名依旧通过微博征集:“7·23惨案过去两个月了,就相关车厢旅客名单的追问,大家自二十天前开始进行的每日一问,等到的始终是对方的沉默。因此我决定把追问的形式改成一封集体签名的函件(见<http://t.cn/aglGjM>),这样起码还有望等到回音,因按照行政管理的规定,两个月之内必须给予答复。签名(姓名+城市)至十月五日止”(微博时间:9月24日,转发2826次)。该信于10月7日邮寄给铁道部部长,其后所附签名为380人。

10月,一份《723甬温线动车组重大追尾事故非官方调查报告》在网上流传开来^①。该报告“基于网络消息,媒体报道,铁路论坛的资料以及铁路论坛与百度文库的私人上传学术资料为技术支持”,从事故概况、时间、经过、可能的事故还原、事故之后的救援行动五方面作了捕捉还原事故细节的努力。对整篇文档进行文本分析,将其所涉及的各项事实类和专业类信息汇总如下:

表1 《723甬温线动车组重大追尾事故非官方调查报告》参考信息及出处

分类	来源	形式	内容
事实类信息	新华网	文字及图片	动车事故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视频(个人拍摄)	温州市民动力伞航拍事故现场
	东方网	视频	对事故时间的报道
	中国新闻网、南方电视台的报道、CCTV实时新闻报道	视频	对救援结束的报道
	新京报、南方都市报	文字及图片	小伊伊获救
	苹果日报	头版照片	救援人员露出的手脚被误认为遇难者
	搜狐	文字	遇难者名单
	新华网	文字	遇难者人数增加
	搜狐视频(东方卫视)	视频(官方拍摄)	填埋及拆解车体
	铁道论坛	图片、聊天记录;	列车追尾图片;与调度作业相关的信息
	天涯	文本	事发前后调度作业过程
	新浪微博	乘客及当场沿线居民发的消息和截图	撞车时间;拆解过程中的图片
	优酷网	视频(个人拍摄)	两车相撞的两次电弧;切割、掩埋车体的视频
人人网	此次遇难的中国传媒大学学生陆海天的个人主页	座位号—以坐代卧的形式—对事故遇难状况的推测	
专业类信息	维基百科	词条	车型及编组信息
	百度百科	词条	“工务销记”、“电务段”、“生命探测仪”、“死后僵硬”
	百度文库	文档:《CTCS-2级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概述》、《CTC使用手册-2》、《ZPW-2000特点》、《CRH1型动车组应急故障处理手册》	“目视行车模式”、“CTC车务终端多站监视界面”、CTCS2系统所用于与列车对话的“应答机原理图”、“应答机实物图”、“应答机安装的图例”、“补偿电容损坏的影响”、“乘客紧急制动激活”
	万方数据	论文:《CRH2型200km/h动车组制动系统》(战成一,南车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对“总风管压力过低”而导致紧急制动的解释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报告原文整理。

这份报告涉及到的信息出处有二十余处,其中不乏非常专业的知识,如对“非常站控”阶段争议焦点的“目视行车模式”以及和谐号动车组的制动系统的解释。作者未表露自己的身份,是否是相关领域的学生或者一定程度的专业人员。但仅从所援引的这些材料看,这些都是网络上可以公开查找到的线索,只要是比较擅长逻辑思维、具有较强学习能力和较好的基本知识素养的人,都有可

^① 来源:百度文库;作者:十号战机;时间:2011年10月1日。

能是这样一篇报告的作者。

两份报告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让我们看到能与官方话语几近并驾齐驱的民间表达,不仅在各种情绪性的汇集上发生,更已延伸到更为理性的专业知识领域。真相固然重要,但比起真相更重要的是,网络时代赋予了每个网民拼贴真相和解读真相的权利。报道先机的丧失、处理进程的曝光、信息传播控制的失效,已然使国家对于部分公众来说(尤其是网民),丧失了生产真相的权威和道德高地。与此同时,前网络时代所无法想象的海量信息充斥网络的各个角落,绝对真相已然不复存在,人人都有自己认为的真相。视频《天堂列车》^①里,失去了丈夫的王女士在片尾的话中透出深深的绝望,触动每个听者的内心:“这个社会,我已经对他不抱任何希望了,什么等到真相大白的那天。没有什么真相,真的没有什么真相,还有什么真相啊,肯定不可能再给我什么真相了,真是奢侈得不能再奢侈了。”

在底层表达被唤起,政府公信力又同时欠缺的情况下,官方公布的每种真相都会引发更多的质疑^②;可以说,人们质疑的已经不再仅仅是真相,而是国家生产真相的方式;人们想要的也已经不再仅仅是真相,而是以个体化建构真相的方式,表达其对生长于斯的国家和社会的解读。至此,表达空间的争夺已经到了更为本质的层面——转型时期,总体性社会原有的信息控制设置和互联网带来的平等力量之间的内在张力。

(五)一年后:未完的尾声

在动车事故引发的微博热潮告一段落之后,各部门针对微博客的管理规定陆续出台,再一次昭示着国家对网络上公众表达空间的持续的全方位型塑。2011年12月16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制定《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出台,第九条明确指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注册微博客账号,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信息内容的,应当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不得以虚假、冒用的居民身份信息、企业注册信息、组织机构代码信息进行注册。这项规定被通俗地称之为“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在操作上通过手机号绑定实现,使网民面对国家强力时的匿名保护套被揭去,再一次赤裸裸地暴露在老大哥的注视之下。

2012年初,S市市委宣传部也以内部文件的形式下发了《本市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微博客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以新闻媒体、新闻媒体从业人员身份开通和使用微博客,具有职业属性”,其开通需要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备案,其运行应“建立并执行严格的内容审核制度”。该文件还对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微博客内容做了特别规定:“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微博客应参照媒体官方微博客的审核标准,对其内容进行把关,发布或转载信息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宣传纪律”;“未经所在媒体同意,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微博客不得发布利用职业便利获得的各类信息,不得发布本媒体未刊播的新闻报道”。这可谓国家权力在与新媒体争夺表达空间时的又一有力举措,重申媒体从业者的身份与发言之间的捆绑,意味着总体性社会治理逻辑下的信息控制很有可能将再度生效。

四、简短的小结

本文围绕7·23动车事故不同阶段的微博动态,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新媒体时代的公共议题的表达是如何在各种制度限制下被网民主体建构的,体现了互联网诸多技术手段所蕴含的平等力量和总体性社会全面控制之间的张力。事件过程梳理如下:

^① 《天堂列车》,腾讯新闻 京华视频 联合录制,摄影、剪辑:曹宗文;监制:骆永红。优酷视频网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30DEyMzAw.html)。

^② 最终定稿的官方报告就公众舆论对相关部门采取的救援措施以及应急处置措施的四大争议焦点——8小时停止救援、项炜伊获救、掩埋车头、恢复通车——一一释疑。但即便如此,浏览微博上的转发和评论,公众对报告的质疑依旧不断,集中在对54人的具体处罚程度和方式的质疑;以及对上述释疑中所体现出来的国家常用的分级剥离归责(下级有误,上级制止)的释疑逻辑的质疑。

表 2

事件过程梳理

阶段	第一现场 (事发后 2 个小时)	事故救援 (2011.7.23-25)	头七 (2011.7.29-31)	等待事故报告 (2011.8-12月)	尾声 (2011 年底至今)
国家控制	缺席	救援人员、官员到场;事发现场及附近村庄拉起警戒线,真相被隔离。	中宣部下达淡化报道的指令。	国务院成立专家调查组;出具事故调查官方报告。	以微博实名制为主要内容,各省市制定微博管理规定。
网民表达	在场者以手机、相机、摄像机记录;通过微博播报第一现场。	得以进入现场的媒体从业者以个人微博播报事故进程;通过微博实现全民在场,对官方形成舆论压力。	媒体人以个人微博贴出被撤版面;网络上民间头七纪念汹涌。	公共人士收集民间旅客名单、组织提起向铁道部追问名单的信访程序;网友出具非官方事故调查报告等。	对微博管理措施的反馈多停留在个体化表达阶段,尚未形成明确的集体表达。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见,双方对表达空间的这场争夺沿循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展开。国家沿循总体性社会治理的逻辑,在新媒体时代仍试图通过行政权力对事故现场、信息传播、真相解读的各个中心环节实现控制,乃至最后对新媒体的社会化运作作出限制(实名制)。网民则充分实践了网络架构的“群蜂思维”优势,通过“去中心化”的信息生产,赋予每个节点上的个体共同决定文本含义的新角色,使民间智慧得到了最大的调用和汇集。各种技术手段、敏感时点、专业知识、维权实践经验等等,都被网民用在严密控制的制度背景下营造、扩张表达空间。整个过程展现了一方一再设限,而另一方则一再突围的两种力量。网民体现出对信息技术天然的亲和,以极强的主体性最大化草根群体发声的权利;而国家也体现出很强的适应性,调用可得的行政资源,对信息技术带来的变化全力应对,即使在反应上有所滞后,但在权势上仍优势明显。双方孰胜孰负,结果尚不明朗。本文着力描述这两个主体、两套逻辑内部的张力,背后想展现的更深刻的问题是: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在生成时不得不面对的制度惯性的黏连。

这个过程展现了技术和社会互构的复杂性,尤其是面对重大公共事件,处理不慎将威胁到执政合法性之时。信息的自由流通不仅建构了网络上的公共表达,而且催生了现实中的集体行动,事故之后温州的全城动员也是本案例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在此意义上,微博充分实现了其在阿伦特意义上的具有行动指向的“公共空间”的功能。

如果说网络上关于事故现场和事发真相的表达建构是一场国家和公众之间没有硝烟的话语争夺,那么,事发之后温州的全城动员,则是在国家缺席情况下,自主表达和信息自由流动所激发出的社会自组织潜力的最好的证实。事发 3 小时候后,温州市民通过微博得知消息,自发涌向当地血液中心献血;事发次日中午,温州义工团体组织成立萤火虫私家车队,义务运输伤员及家属;当地企业随之加入进来,为救援人员及献血者提供水、面包和牛奶;快餐店也纷纷贴出免费给市民提供营养餐的招牌。灾后的全城动员重塑了过往的“温州暴发户”的形象^①,也让我们看见表达空间衍生而来的社会联结的萌发^②。

这种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发声能力和自组织能力,正是本文所要强调的公民权和公民精

① @PE 杨思思:这就是温州的暴发户:事故发生了,周边的居民摊(趟)着烂泥去救人,新闻没有航拍,有直升机的自己开飞机去拍,血库没有血了,富二代开豪车去献血,伤员进医院了,院长说救人是最重要的,不谈钱,献血了,温州的餐饮说献血的人免费享受营养餐。中国可以多点这样的暴发户不!(7月24日13:04)。

② 在动车事故以后,这俨然成为了一种常规的动员模式。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61年来最大暴雨,微博再一次激发了社会自组织潜力。暴雨使机场滞留8万多乘客,北京市民自发通过微博组成了“双闪车队”,“望京人赴机场免费救援”话题一时位列话题榜第三;此外,“爱心留宿”活动也得到多家酒吧、会所、公司的响应。救援标志、集结地点/联系人、增援需求、路面情况、宾馆情况等信息由网友及时播报并在微博上流通,使微博再一次成为协同全社会之力的节点,使这场发起于国家之外的社会动员井然有序。

神,对于自身权利的敏感是其发声的基础,对于公共参与的热情是其联结的动力,两者共同指向的是对于独大权力的限制和对于弱小社会的开启。无论其是否短暂,至少滋生了一种中国社会欠缺已久的独立声音,推动了国家-社会关系的重塑。

同时,对网络表达和舆论的讨论无法回避的一点是其与“网络暴力”的关联。由于互联网低门槛、匿名化等局限性,在很多时候确实容易引起“群体极化”的现象,似乎与公民精神对立。本文观点是,理性的公民精神只能在信息的充分自由流通中才能得到培育,将判断的权利交还给大众,培育好的“公共生活”,才能使“暴民”成为有判断能力的理性公民个体。在诸多谣言和恶意攻击背后,我们要看见,事实被细碎化为若干“细节”,随后被网民有选择地以夸张、对比鲜明的方式呈现,网民对这种对立式表达的自发选择,背后原本就隐藏了其对现阶段社会矛盾的解读。

参考文献:

- 陈秋虹,2011《技术与社会的互构》,《青年研究》第1期。
- 凯文·凯利,2010《失控——全人类的最終命运和结局》,陈新武等译,新星出版社。
- 李永刚,2009《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乔治·奥威尔,2006《一九八四》,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丘延亮,2002,《导读:希望的主体——杜汉的社会性运动论诤与台湾社会性蜕变》,舒诗伟等译,载涂海纳,《行动者的归来》,台北:麦田人文出版社。
- 郭于华等,2011,《社会新趋势报告导论》,清华大学课题组,未刊稿。
- 沈原,2007,《社会的生产》,《社会》第2期。
- 施芸卿,2007,《机会空间的营造》,《社会学研究》第2期。
- 夏晓鹃,2006,《新移民运动的形成——差异政治、主体化与社会性运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61期。
- 郭于华,《居住的政治》,“居住的政治”课题结项报告,北京:清华大学,2011年12月,第1-25页。
- David Noble, *America by Desig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Capit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Emmanuel G. Mesthene,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Society”, in William B. Thompson ed., *Controlling Technology*,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1.
- James C. Scott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arshall, T. H. 1992,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In T. H. Marshall & Tom Bottomore (ed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London: Pluto Press.
- Seyla Benhabib, “Models of Public Space: Hanah Arendt, the Liberal Tradition, and Jürgen Habermas”, in Craig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2.
- Shanthi Kalathil and Taylor C. Boas, *Open Networks, Closed Regimes: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Authoritarian Rule*. The 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2003.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陈 昕